

唯物論十年

柳田謙十郎著

王敦旭、刘永鑫譯

唯物論十年

柳田謙十郎著

王敦旭、刘永鑫譯

生活・讀書・新知三联书店

一九六二年・北京

出版說明

本书是我們 1958 年出版的柳田謙十郎所著《我的世界观的轉变》一书的續編，系根据 1960 年东京創文社日文版譯出。

264/01

唯物論十年

〔日〕柳田謙十郎著

王敦旭、刘永鑫譯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50 号

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 4 $\frac{1}{2}$ · 字数 94,000

1962 年 7 月第 1 版

196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6,800 定价（七）6.50 元

統一书号 2002·166

序 言

今年初夏，我收到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員莎符娜扎洛娃女士的来信，說《我的世界观的轉变》一书的俄文版将于最近再次印刷，希望我写一点該书发表之后的思想发展情况，以便补入。当时我正在写《唯物主义倫理学》一书，此事未能立即着手。入秋以后，《唯物主义倫理学》一經告成，我旋即按照她的要求，把1950年以后十年間我身边发生的事情，在可能回忆出来的範圍內，取其梗概，每天写下几千字。一动笔写起来，种种往事便接連不断地涌向心头，終于成为在分量上和上次写的《我的世界观的轉变》一书大致相同的东西。按內容來說，它揭示了日本战后社会思想史的一个断面，也多少是有点意义的。因此，我决定在出版俄文版之前，也刊行日文版。这本书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我想在日本劳动人民中間，大概也有不少人是关心我这十年来的斗争的，如果这部小小的著作，能对他們决定今后怎么生活起一点参考作用，那就是著者望外之幸了。

著 者

1959年12月

茲当人类的导师弗·伊·列宁诞生
九十周年紀念，謹将这本小小的书献于
他的面前。

著 者

1960年1月

目 次

序 言

一	同旧思想残余的斗争·····	1
二	同旧思想残余的斗争(續)·····	9
三	参加学生和平运动·····	19
四	日本和平委员会·····	30
五	工人和青年的教育·····	42
六	探求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旅行·····	54
七	宗教和历史問題·····	65
八	自由問題·····	76
九	奇迹的友情·····	86
十	应邀訪問苏联科学院·····	97
十一	道德問題·····	110
十二	最近的成就·····	122
	結束語——关于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·····	137

一 同旧思想残余的斗争

十年以前，即1949年秋天，我放棄几十年的唯心主义者的生活，向唯物主义迈出了第一步。第二年春天，为了表示自己决不后退，我又进一步向社会公开宣布我已經轉變。我已經到了一般应是旧思想根深蒂固而不易有所改变的年紀，况且又曾以批判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終身任务，这样的人突然作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无怪要使当时的社会大为轰动，引起支持和反对两种不同的議論了。由于世間的批評过于强烈，我自己一时也不得不感到多少有点动摇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但是，这十年的岁月終归把所有这些問題都适当地解决了，我已經到达了本来應該到达的地点。我虽然像是渡过了一座非常危险的桥，但是世界史的发展越来越清晰地证明，我所走的道路果然沒有錯。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，首先就十分鮮明地证实了这一点。只看看力量对比就可以了，十年前的国际力量对比，即战争同和平的力量对比，現在不是已經完全倒轉过来了嗎？現在，不管資產階級反动宣傳使出多大力气，已再不能无视也不能輕視社会主义的力量了。国民已經不答应反动派坚持反共政策了。就我个人來說，即使遭遇到再大的困难，即使身陷怎样痛苦的境地，也不会畏縮，不会动摇了。

然而，能达到这个地步，到底还是費了十年岁月，其間我曾遭遇到并且克服了种种困难。真理不像貨幣，不能一把它抓到手里就馬上完全成为自己所有而随心所欲地去使用。旧

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同一人的身上，而在互相矛盾、互相对立、互相斗争着。我在理論上，破唯心主义、立唯物主义这一总的方向大致已經确定，但是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的旧观点和旧社会习惯，还牢牢地、彻骨地糾纏住我的身心，不易摆脱，想猛然一下子把它除掉是办不到的。因为旧观点和旧社会习惯是和其他各种东西联系在一起的，只要整个关系不改变，想只抛棄一部分也不可能。归根到底，只要仍在資本主义的範圍內生活，就不可能彻底改造自己，完全变为新人。因此，变革社会和改造自己这两方面的努力，必須經常統一起来。把社会放在一旁，只希望自己成为好人，成为杰出的賢哲，这种想法是錯誤的。所以，尽管我現在还是个沒有改造好的人，但我的方向却已經牢固地确定了。不管別人怎样議論，哪怕国家使用一切权力来压迫我，也决不能使既已到了这个地步的我发生絲毫的动摇。十年的岁月好容易才把我的信心培养到这种程度。

由动摇到确立信心的过程，决非仅只我一个人的事体，今天生活在資本主义社会里的几亿人，在今后几十年剧烈的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，恐怕誰都迟早要经历这个自我改造的过程的。如此看来，我这十年的历史也就未必是件只具有主观的个人意义的私事吧。

轉变之初，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問过我：“你为什么向那儿轉变？”其中很多人甚至罵我簡直是个沒有节操的叛逆分子。为了解答这些人的疑問，我写成《我的世界观的轉变》一书。現在看来，要正确地答出这个“为什么”，倒是件頗不容易的事呢。因为人們的主观意識和思惟，无论怎样敏銳地反躬自省，也未必能把它的所有真正的客观原因确凿地反

映出来。恰如一个失去健康的人，当别人問他是什么原因时，他虽然自己想到这样那样一些事实，但真正的医学上的原因却往往与此完全不同。

我在《我的世界观的转变》一书中，曾列举我转变的主要原因是：上次战争夺去了我长子的生命；日本再次被卷入战争漩涡的形势已露出苗头，等等。如果讲得再详细一些，除此以外，我自身也有许多使我必然转变的原因。我是个精神和体质都极为软弱的人，因此从少年时代起就产生了自卑感，在朋友面前不敢坚持己见，总是让步，并且往往受欺侮。然而，說也奇怪，我的正义感却很强，曾有几次于反对教员的言论和学校的方针而在朋友中间受到孤立，或让先生盯上，把我当成个叛逆儿。师范学校毕业之类，我的学业成绩可算是相当优秀，但操行方面却好像也得过不大美妙的评语似的，我被赶到神奈川县最偏僻、最贫穷的农村小学去教书，恐怕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我自己是一点也不知道的，后来听人说，在最有势力的教员中，有人非常恨我，故意这样来对付我。

河上肇先生的《自传》在战争结束后出版了。当我读这部书时，发现河上先生和我，不论在体质上或者性格上，都有那么多相同的地方，使我大为惊讶。当然，河上先生是位伟大的老前辈，像我这样的人是无法和他相比的，拿自己跟这样卓越的人物作比较，这个作法本身就难免被人责备为不逊。但是抛开人格的伟大或渺小不谈，相似的地方总而言之太多，这使我感到惊讶。河上先生在他的一生中，也不止一次地作出当机立断的事。他年青的时候，撇棄了京都大学副教授职位，投入一个叫做“无我苑”的宗教团体；到了晚年，他立志“做共产主义的一名战士”，毅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。这是个出乎常规

的极大胆的行动，是那些巧妙地盘算着个人利益、过于敏感地追逐时代倾向的知识分子连做梦也想不到的。因此，他不仅遭到世间的冷遇，而且终于作为囚犯，长期忍受了监狱生活的痛苦。

同这比较起来，我还是顾虑过多，对河上先生觉得有些惭愧。纵然如此，当回顾过去几十年生活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也曾渡过我那一座相当危险的桥，幸而没有失足落水，总算是顺利地达到了目前地步。想到那些往事，现在好像还不禁要直冒冷汗似的。例如：我拖妻带子一家四口，却辞掉教职，把全部家具都托运到京都，随之前往投考据说平均十人之中只有一人能考取的京都大学，就是这些事情之一。1936年，我辞掉台北大学副教授职务，事先也没有找好职业，一家六口就回到了日本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总觉这件事情也是做得很果断的。而第三次冒险是1949—1950年，我已经到了57岁的老年，却发生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。如果仍做一个唯心主义者或者西田哲学的继承人，由于多少已经获得了社会上的赏识，经济总会有办法维持的，也还有这点自信。但是那年8月已经辞掉教职，连一点收入也没有；以这种一文不名之身开始向唯物主义的道路迈开第一步，就是从自己的经济生活方面来说，这的确是件冒险之举。至于唯物主义，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，我都完全是个生手，是一年级学生。并且，在这一阵营中，从战前起就有无数在千百次战斗中受到锻炼的战士，现在我即使生吞活剥地读下几本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赶上他们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想依靠学问来维持生活，根本就不可能。首先我必须学习。应当读的东西太多了。愈是读下去，愈是读得多，就对自己的不足之处认识得愈深刻。

但是，当时我完全顾不得考虑自己的生活今后怎么办，只为新打开的真理世界的美好和辉煌而忘我。真是万分有趣！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奇怪，像这样真实的、同生动的历史现实相结合的哲学，以前为什么只想去批判它，而不愿意谦虚地学习它呢？世界上竟还有那么多的人，他们现在甚至仍不知道有这个真理，仍旧在为了不知如何是好而苦恼。必须赶快学习，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变为自己的东西，以便传播给世上的人们，那么，大概就能解决当前社会的一切矛盾，就能把绝大部分的不幸消除了。

现在看来，那种看法简直太幼稚、太天真了，但是我曾紧紧抱着那种心情，专心致志地、拼命地、不论早晚、不分昼夜、排除一切地学习、学习、再学习。所幸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，几乎全部已经翻译成日文，在市场上可以买到，这一点比起研究唯心主义还要方便得多。重要的著作和重要的地方，我都查对了德文原版，但在这上面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却是有限。由于我过于一心一意地开始学习，家里的人非常担心，怕我弄坏了身体。因为我的身体本很虚弱，从来使不了劲，可以说只是勉强地活着。可是，人确是一种奇怪的东西，只要你真正打起精神，疾病这类玩意儿便要退避的。以前如果一天学习三、四小时以上，第二天便要头痛、背痛或者腰酸，不能继续下去，可是从学习唯物主义之后，却能从早到晚只要有暇就伏案读书，家里的人好像为我而焦虑，说照这样下去，劳累加劳累，总有一天必定要积成大病。但是一直也没有生病。对我说来，这也许可算是一种奇迹了。

即使如此，就当时的我来说，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，的确也还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首先，以前我所受的教育完全

是唯心主义的，我的头脑已經僵化了。我首先就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一說法：利益支配着人們的行动。我当时认为，从倫理上来看，以經濟利益之类为动机是卑鄙的，真正的人，他的行动不会为利益所支配，他必須以真理和正义作为行动的最高原則。并不是“是怎样”决定“应当怎样”，而是“应当怎样”决定“是怎样”！人类之所以为人类，其宝贵的价值就在这里！成为唯物主义者之后，我的这种唯心主义残余还留在思想中什么地方，很不容易去掉。我曾认为我自己的行动就不是受利益所支配的，如果从利益这一点着想，仍旧做个唯心主义者岂不安定得多，并且更能保全生活門路。就我自己和家庭來說，如果不发生革命，倒不知多么舒暢自在！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丢掉了西田哲学而来到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，这是因为我認識到馬克思主义哲学里有深刻的客观真理。所以，我想別人也一定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。社会上有許多人，虽然他們的生活比我貧苦得多，但他們却想去皈依宗教，或者去恭听唯心主义者的說教，其所以如此，正因为他們不知什么是真理。無論是誰，只要他認識了真理和正义，就一定能追隨它！我轉变为唯物主义者之后，上述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仍然糾纏在我身上，可說是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，毫不动摇。

我在讀馬克思的早期著作（例如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》）时，看到这样一段話：

“哲学把无产級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，同样地，无产級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；思想的閃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沒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，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。”^① 当

① 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1卷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頁。

我讀到这段文章时，簡直欢喜若狂，用紅鉛笔画上了綫，标上小圓圈，不知反复讀了多少遍。对，来把这个真理更加淺明地傳播給日本的无产阶级吧！这样他們就一定会站起来的。这就是我的使命！

就是在这前后，我在硬彩色紙上写下一句話，当作座右銘挂在自己的书房里。這句話是：

“真理一旦掌握了群众，
历史就会前进。”

有一天，主办《真相》月刊的佐和庆太郎先生找上門来，說要出一本书——《人，真理的探求者》。他說，这本书准备請四、五人合写，希望从各个角度来闡明：人，无論是誰，只要他真正想为寻找真理而生活下去，那就只有成为共产主义者。当我听到他的打算时，我举起了双手表示贊成，这也是出于我的上述意願。我記得合写这本书的，除我以外，还有古在由重先生、国分一太郎先生和另外两三个人。当时正临近国會議員的选举，于是我想到，假如这本书能够暢銷，就一定会使这次选举产生好結果。現在人人都好像怕被称为“赤色分子”，人人都好像憎惡“赤色分子”，討厭“赤色分子”。可是我想到：这一定是由于人們不知道馬克思主义是无比正确的理論，由于人們不知道遵照馬克思主义去行动是如何正大光明；現在无論是誰，如果他真正想本着理性和良心生活下去，那么除了站到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立場来看待事物，除了按照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来实践以外，沒有其他的道路。把这些告訴給人民群众，使人民群众拿出自信和勇气站起来，这就是我的历史使命！想到这里，我的精神振奋起来了，不自量力地全身充滿了必胜的信心。

但是实际做起来，才知道要把现实推动起来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首先，要向人们讲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正确的，就非常不容易；并且不能认为我自己转变了，别人也一定会和我一样地变过来。资产阶级反动宣传的力量，已经渗入到所有人们的心灵的各个角落。“赤色分子”可怕，“苏联是暴力国家”，这一类的观念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把它破除的。资产阶级意识，在我自己身上也还有不少，还没有把它清算；甚至自以为进步的人们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，这种思想也还牢固地保留着。而且，现实的利害有着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，它常在当事人本身不知不觉中发生作用。不管是如何正确的真理，不管是如何客观的真理，如果人们的当前生活利益同它发生矛盾，他们也会尽可能地否认它是真理，是正义。即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是真理，是正义，也未必就肯跟着它走。因此，为了使真理和正义真正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，必须设法使它同人们的生活利益结合起来。不管人们怎样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，如果不是自己的现实的生活条件迫使他们，也还是未必会愿意跟着它走的。通过反复的、不知多少次的失败经验，我才痛切地领会了这个道理。到这时，我才似乎真正明白：连这样极为普通的真理，不经过相当长期实践的艰苦奋斗，也不能把它真正变为自己的东西，至于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又该是如何困难，要使别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，其困难为如何就更不用说了。

論文：《唯心主义哲学的将来》，載《世界評論》杂志 1950 年第 3 期。

論文：《西田哲学的克服》，載《日本評論》杂志 1950 年第 3 期。

著作：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》，弘文堂 1950 年 3 月出版。

論文：《真正的人》，載合寫論文集《人，真理的探求者》，青銅社
1952年5月出版。

二 同旧思想殘余的斗争(續)

資本主义社会是金錢万能的社会。貨幣可以决定所有事物的价值，可以支配人們的一切願望和行动。人人都为錢而劳动，为得錢而焦虑，受金錢所操纵。所以，尽管有人想依靠真理和正义把人們发动起来，但仅仅如此是很难发动的，如果借金錢之助，就轻而易举了。当你生病时，即使請求別人来照顾，誰也不願意拿出一天時間为你操劳，但是假如你說出工錢，纵然是一两个月，也有无数的人願意干。艺术、学术、政治和宗教都为金錢所摆布，用錢来买卖。甚至人們本身的价值也是用金錢来衡量的。

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們，不管他怎样热爱真理，如果忽視金錢，便会連生活也无法維持。我虽然在思想上已由唯心主义轉变成唯物主义，但惟独这件事还无法立刻把它改变过来。因为这并不仅是我个人的思想問題，而是涉及社会物质結構的問題。但是，唯物主义是用来改革社会物质結構的理論，当然負有实践的使命，因而唯物主义者对待金錢方面，也必須采取和唯心主义者迥然不同的态度。我之所以成为唯物主义者，原因既不在于想錢用，也不在于认为做唯物主义者就能得到更多的錢。事实完全与此相反。当我是唯心主义者的时候，我曾迎合資产階級反动宣傳的要求，被杂志、报纸、广播(当时还没有电视)所利用，得到不少收入。然而，在轉变成

唯物主义者以后，不知不觉之間，就几乎完全被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宣传机构所敬而远之了。随着我越来越明确地站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，它們的敬而远之也越来越厉害，最后，所有这些机构都完全不再理会我了。

曾經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某一家报社托我以《关于职业革命家》为题，写一篇几十張稿紙长^①的文章。他們的目的大概是想让我多少罵一罵革命家，想让我写这一类的話：革命也是一种职业，革命家虽然嘴里說的是为了人民，但实际上是拿革命混飯吃，所以要對职业革命家提高警惕！但是我却在文章里歌頌了列宁和毛澤东，說他們是人类的导师，是最卓越的、具有世界最高尚的人格的人物。我在文章的結尾写道：“如果要举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偉大的、最值得尊敬的人物，我认为那不是孔子，不是釋迦牟尼，也不是基督，而是弗·伊·列宁。”报纸編輯在接到这篇稿件两三天后，跑来对我說：“柳田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报纸和杂志都不能登你这样的文章！”随之把稿件退还給我，进而又怪亲切地启发我說：“写这样的文章，您是无利可图的！”“无利可图”，这句话引起我强烈的反感，以至現在仍留在記憶之中，难于忘記。我并非看錢写文章！別拿人开玩笑！我觉得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不小的伤害。

我并不认为我是个貪得无厌的人。我对于享受之类本来就几乎完全不感兴趣。所以對於金錢，我的欲望并不太大，只要能够維持住一般的生活就可以了，并不希望得到多余的收入。我总是向往朴实的生活。預先我就知道很清楚：轉变成唯物主义者以后，收入会减少。拿演讲的报酬等等來說吧：如

① 日本的稿件一般不按字数計算，而按張数，一般每張四百字。譯时不便改为字数，本书各处仍譯为張数。——譯者

果演讲会是由资本家举办的，便会送来相当多的一笔钱；如果给工人和学生做演讲，那就完全谈不上报酬。看情况，甚至有时出门连电车钱也得自己拿，到会之后，他们连一句感谢的话也不说。这也没有什么，因为事前早就考虑到了。但是有时也产生一种灰心的情绪，觉得自己的演讲（稿件也是一样）竟被估得那么不值钱，突然下降到唯心主义者时代的几分之一！不要报酬当作别论，拿了钱而又太少，这时就觉得被人家贬得简直太低了，仿佛在说：“你就值这么点钱！”不仅是钱，以往出去做演讲时，如果是大学邀请的，校长和教授便出门迎接，如果是公司，老板和经理便前来欢迎，把我请到贵宾室里，请我住第一流的旅馆。可是现在呢，由一两个贫穷的工人带路，让我从车站一直走着去，或者让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垫上带我去。到会场一看，还没有几个人来，既没有休息的地方，也没有人送杯茶来喝。让我在那宽阔而空洞洞的会场上呆呆地等待一个多钟头，然后对好不容易才来到的几个人讲话，讲完就动身回去。甚至有时按照约定的时间、到达约定的车站之后，没有一个人来迎接，也不知道会场设在哪里，只好又转身回家。所以就不由地觉得人家看不起我了，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落魄了。

我在参加“松川事件”^①调查团，从松川到福岛和仙台去

① 美日反动派为了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而制造的事件。1949年8月，一列火车在松川车站附近出轨。日本反动政府诬陷这一事件是日本共产党人制造的“暴行”，逮捕了共产党员和工会干部二十人，严刑审讯，判决绝大部分无辜被告以死刑、无期或长期徒刑。美日反动派的这一镇压，引起日本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怒，日本人民为揭发美日反动派的阴谋和拯救无辜被告，昭雪冤狱，十二年来以各种方式、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，迫使日本法院进行“重审判决”。1961年8月，日本法院宣告“松川事件”全体被告无罪，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。——译者